



在人心的混沌与清醒之间

——我的文学“追问”之旅

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反腐纪实文学作品《追问》上市两个月，保持着日均销售近万册的纪录，数周雄踞全国非虚构文学排行榜之首，引发了今年春夏之交反腐题材文艺的创作热潮。然而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——《追问》引发的全民式的“追问”，恐怕才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目的和意义。作者丁捷是当代著名作家，此前一直写作青春题材作品，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在写作方向上发生了“转向”，推出了这部“反腐纪实文学”作品？应本报之邀，作者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作体会。

——编者

□ 丁 捷

—

作为一个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的人，我在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，有过许多不适。我对文学的偏执和依赖，在参加工作进入现实生活后，处处受到撞击。我对世俗日常的缓慢进入，对世态的惯于挑剔，以及处理生活细节上的迂拙，使自己时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。江苏女作家周淑娟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《作家丁捷：天真人》的文章，回忆当时见我的情形：

“与丁捷的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瞬间，有点失望。在南京出版人办的凤凰台酒店，他憨憨地走过来，高而又胖，那样子就是中国流行的企业老总范儿，应酬过度，宅过度，皮肤雪白，神智松懈；但一留意，也见有些世故的精明，在眉宇间坏坏地闪烁。丁捷那时正在一个省属的文化集团当副老总，我就心想，看来传说中的大才子，至少外形没有长得脱俗。丁捷送给我一本新书《沿着爱的方向》，设计很精美，用了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的作品作插封。丁捷示意我翻开扉页上的作者照片，说两三年前，鄙人是这样潇洒的。我一看果然英俊小生啊！丁捷紧接着自嘲：适当用点年轻貌美的照片，不算无耻，实属无奈，写诗嘛，要有点写诗的样子。”

这段文字是我那个年龄那个状态最好的写照。这段文字表述出来的年轻人，其实是我固有的人文情怀所排斥的，也是今天我回忆起来最无趣、最飘浮的一尊形象。人越在俗处行走，就越是不能从俗中自拔。但意识到要自拔，这个时候往往有残余的理想和浪漫在作怪。内心里，我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做一个对纯真的感情有抒发欲望的人，对美好的世界有无限向往的人，对虚伪和邪恶有痛击冲动的人，对自己有约束有要求的人。这份难得的心曲促成了我后来的援疆经

历。36岁那年，我主动给组织上打报告申请援疆，此后3年在新疆任职。新疆博大的自然和浓郁人情，重塑了我内心的热诚和纯粹。当援疆结束，被西域烈日晒得浑身黝黑的我回到南京，在这个甚嚣尘上的发达都市里，我又面临着新的不适，我重新变成了一个激愤的理想主义书生。此后的几年，我因等待新的工作处于半赋闲状态，我拿起了书本，以及笔，在2010年写作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《亢奋》。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，成为电子阅读的千万点击量作品。它是一部直面当时现实社会及其“精英群体”的作品，击中了某些时弊——物质主义的亢进，使人在权谋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，催发人情堕落，人心扭曲，人性退化。现在想起来，《亢奋》的写作冥冥之中就指向了今天的《追问》。没有昨天的《亢奋》，也许就没有今天的《追问》。

二

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，我被任命为一家省属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。毫不讳言，我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些改变——最大的改变，当然还不是生活，而是内心。几年里，我听闻所历，可以深度嵌入记忆的非常故事，比任何一段工作时期都要多，我内心的振荡频率与幅度，远远超过既往。

不久之后的一次工作交流中，上级纪委的一位领导对我说：你是一位作家，比一般人更敏感。你跟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反腐败这份职责带来的情感冲击，面对的，有怀疑和曲解，有助阵有反感，万人千面，百种声音十条心，你要梳理清楚，替我们发声，替我们、也替我们在挽救或斗争的那个群体，做真实的文学表达。你写了很多作品，但你欠一部从自己本职工作出发，而到达受众内心的作品。他还说，我们说到底，做的是人心、人性的工作，纪委书记本质上跟作家没有什么区别。

我决定写一部作品，比《亢奋》更现实、更深入人人心情人性的作品。在灵感出现的时候，它的寒冷和尖锐，使得我没法去想象除纪实之外的任何一种文体，可以驾驭它！是的，它必须是纪实的，文学的一切生动，都要为真实服务。

在灵感出现的那个夜晚，我既兴奋又痛苦，我知道这部作品一旦写出，投放社会，也许会引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

决定写这部作品，开始我的“问心之旅”后，我陷入了经常性的失眠。躺在床上，看见从白日的喧嚣中宁静下来的夜空，闪烁的是无数的星星，暗藏的是莫测的黑洞。人类喜欢把博大的宇宙，比喻成自身的心灵世界，所以，遥望星空的时候，往往就是追问自己心空的时候。睁大眼睛，难以入梦。与其说在夜空失眠，不如说是在心空里徘徊。替我这个群体，也替他们那个群体。偌大的中国，芸芸的人生。夜空下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在混沌，多少在清醒，多少因混沌后的惊醒而无限。

三

通常，一个人容易从他的“出身”里找到表达的方式，形成话语的风格。“纪检”这种背景里的作家，必然有话题的诸多顾忌，表达的诸多障碍。出于身份的严肃性，我们慢慢养成了“说大、不说小”的习性。具体说，就是宣讲政策、解读纪律、破译重点案例的时候，口若悬河，说到自己的日常工作，则寥寥数语，甚至三缄其口。但是纪检事业完全又是做“人”的工作，做“人情、人心、人性”的工作，时间长了，感动太多，感慨太甚，感悟太深。心中有事，久憋成患。即便不为自己，从做人责任与角度担当出发，我也需要把从业心得与人们分享。事以知之，情以动之，理以晓之，我认为这应该算是尽一份本职。

我写作的《追问》，所“追问”的并不是自己和同行的阅历。而是从自己和同行的立场出发，披荆斩棘地上路，进入另一个群体——一群被处分或办法的高官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。能否做好一场成功追问，在午夜的空洞里，寻找到黑洞深处有价值的“暗物质”，取决于我到底能不能勇敢地进入到这些黑洞，却保持着光明的睿智和温和的倾听姿态。

从上级纪委提供的公开半公开的633个案例中，我遴选出28个省管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，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，和其中的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，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、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。最后，又从中选择了8个典型，进行深度记述。

在将近两年的材料消化、当面访谈、实地采风和着手创作的过程中，毫不夸张地讲，我的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。固然，浩瀚的材料研读和大量的走访活动，使我皓首穷经，但最折磨人的，并非烦杂繁重的工作量，而是身份的扭曲和心灵的灼烧——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，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身份，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，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恶恶，反映他原本的内在形态，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。而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，一套套多么荒诞的人生逻辑，一种种多么无常的好恶，一番番多么怪诞的精神形态，他们纠缠在一起，混乱成一团，激愤着你的常情，颠覆着你的常识，涂改着你的常理。多少次，我对自己说，我无法睿智了！多少次，我对自己说，我无法温和了！当我太多地追问了他们的灵魂之后，我感到自己的灵魂，成了他们的“众追之的”。

然而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读到了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乔治·奥威尔的一段话，阐述“我为什么写作”——“写一本书，就是一次可怕的、让人殚精竭虑的斗争，就

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折磨。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力的驱使，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”。

我混沌的认识像被豁然拉开了一道口子，顿时明亮了。我过度沉浸在题材的灰暗本身，而导致了写作的疲惫。我忘记了在这题材的内里，是一定能够寻找到驱使我坚持下去的某种魔力的！

四

我得以面对面访谈的官员，有几个属于严重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，更多的属于违法犯罪，被移交司法机关并被判刑入狱，还有的正在双规过程中。跟他们交谈，我发现他们虽然都不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认错、认罪的思想，表现出懊悔和自责的态度，除了个别人，如《曲终人散》的主人公，自认为看透人心，灰心丧气之外，其他人无不存有强烈的改造世界观、将功赎罪、重新做人的欲望。但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具有的特点，就是，混沌。许多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他们内心的问题症结，他们根本看不清自我，问不到内心的真实。

中国古代有一句官场信条，叫作“难得糊涂”。封建社会江山社稷是皇家的，你为官一方，干得好、干得孬，与你并无多大关系，所以，最好不要顶真，眯缝着眼睛在官场混世，是一种聪明，一种练达。然而，今非昔比，到了今天，人民天下，官员的清醒与糊涂，影响着一方水土上的物质与文明，也就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。如果为官者还在“难得糊涂”，那就不是聪明，而是不正了；那就不是“难得”，而是“缺德”了；那就不是太平混世，而是要坐等出事了。

然而，综合观察这些失足高官的人生，引发致危致命“混沌”的時刻，无不在他们成为“成功人士”之后。而成就成功人生的前半程，他们

大多是激情洋溢，奋进向上的。在攀爬到一定高度，获取了权力之后，他们就迅速滑向了骄躁和颓败的后半程，并有朝一日在那里彻底摔倒，鼻青眼肿，头破血流。人们为此心痛，也为此迷惘。许多人为此煮心熬骨地调查研究，追问了无数的为什么，回答了无数的为什么，就是找不到一个清晰的、权威的结论。很多人把权力导致的人生悲剧，寻根为传统文化的残毒，归结为现行体制的缺陷，甚至追究到人性中的欲望天性。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这些问题，我都关注到过。我觉得这些思考都有必要，这些探讨都有价值，这些结论或多或少，都能沾边儿。

然而，我们必须抱持辩证，着眼全面。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无法避开：更多的同僚前半程，跟他们并无差别，可到了后半程，他们却分道扬镳，行走到不同的世界去了。少数的他们和多数的他们，到底为什么同途殊归？他们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？既然违法乱纪依然是庞大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，我们怎能以这极少数样本，去判断整个群体背后的文化和体制，甚至人性的是非呢？

我陷入了深深的自问。既然，我无法驾驭这么宏大的命题，来观照中国干部群体的内心和发展，那我还是把目光，投回到我深度访谈过的这一小群高级官员的身上吧。也许我能对这个群体作一个简单的描画，哪怕是感性的！毕竟，我有了那么多跟他们面对面促膝谈心的日夜，我面对过他们急促或冷漠的呼吸，不屑或温和的表情，放荡的大笑或磅礴的眼泪；受他们的情绪感染过，对他们的言论思索过，对他们的行为恼火过，为他们的命运扼腕过，被他们尚存的良知感动过。我风雨兼程，追踪了他们的轨迹；我夜以继日，倾听和记述着他们的许多，甚至一切。也许，从此我更不能忽略他们，我会永远记得他们，而且，努力地让更多的人记得他们，记得他们在来路上的覆辙。

五

那么，《追问》“追问”到真实了吗？到底追问到了怎样的“真实”，有没有追问到怎样的“真实”？这是无数读者反馈给我的新的“追问”。

没有想到，《追问》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。更没有想到，试图解决问题的《追问》，却引爆了更多的问题库。

这，似乎是一个作家，一个基层的纪检工作者无法解决的。但它们来了，喷薄而出，汹涌而来。我，我们，都无法回避。唯有面对，唯有深思，唯有力行。

名家创作谈

杂文撷英

包拯弹劾宋庠

□ 安立志

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皇权历史上，有两个明星组合，一是唐太宗与魏征，二是宋仁宗与包拯，可谓两大奇葩，少有人呈现出明君直臣的制度亮点。虽然不具代表性，但却向来被视为“正能量”。许多学者并未忽视一个事实，没有李世民、赵桢这样的明君、仁君，就不可能出现魏征、包拯这样的直臣、谏臣。

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仅具有考古价值，也有文化价值。古代墓葬中的重要发现，至少可以丰富馆藏。然而，要从中找出当今时代用以治国理政的器物或典制，的确是相当困难的。不过，古老国家自有古老的土壤，古老历史濡染了古老的民风，古老的民众早已习惯了古老泥土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。正是从这点出发，解剖一下包拯弹劾宋庠的案例，并非毫无意义。

宋庠、宋祁兄弟，同年科举入仕，可谓北宋的双子星座。宋庠官位高于其弟，曾任当朝宰相；宋祁文名盖过乃兄，人称“红杏尚书”。包拯弹劾的正是时任宰相、作为兄长的宋庠。皇祐三年（公元1051年）三月，当时的包拯只是一名谏官，甚至不具备检察权力，他居然对当朝宰相宋庠提出弹劾，称其“再秉衡轴，首尾七年，殊无建明，略效补报。而但阴拱持禄，窃位素餐，安处洋洋，以为得策”。

在重视文官的北宋政治中，宋庠具有不俗的文学素养，其诗文在当时

很有名气。此人在官场上老成持重，平和儒雅，颇具大臣风范，但他在政治上却庸碌无能，极少建树。不过，宋庠并没有明显的违法乱纪。这么说吧，这宋庠可说是“孙连成”一类官员的先辈，只是年龄更大、职务更高而已。包拯对宋庠的弹劾一经提出，在仁宗皇帝尚未决断之际，宋庠就对其行径自我辩护，这是包拯无法接受的，因而，他才愤然指责宋庠“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矣！”

怎么看待包拯对一个没有明显劣迹与罪行的高层官员的弹劾？包拯在奏折中作了明确阐述，他认为，对于掌握国家中枢权力的高层官员的评价，不能等同于基层干部一定要有触犯刑律、贪赃枉法的罪行与事证（“非如群有司小官之类，必有违状挂于刑书”），这是因为“执政大臣与国同体，不能尽心竭节，灼然树立，是谓之过，宜乎当黜”。一个掌握国家高层权力的人，无功即为过，因为其执政地位的高屋建瓴，总揽全局，其施政影响也必然具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。位高而权尊，权尊而责重。与其地位、权力相应的是义务与责任。

包拯也深知国人喜欢从过往和传统中找论据的路数，他在奏折中不仅列举了唐宪宗时宰相权德舆因“不能有所发明”“以循默而罢”的历史警戒，而且列举了前次罢免范质等人“只以不称职”“未尝明其过也”的本朝先例。包拯的奏折有实、有理、有据，宋庠只得辞去宰相之职，到地方



艺术长廊

不忘初心

杨国林 / 绘

上“知河南府”去了。

北宋中期，因承平日久，商业繁荣，尽管官员待遇优渥，仍然滋生了享乐与贪欲之风。对于此种弊端，包拯同时期的学者与官员也有清醒认识，李觏指出，部分干部“但行文

书，不责事实；但求免罪，不问成功。前后相推，上下相蔽”。苏轼认为，一些官员“莅官之日浅，而闲居之日长，以其莅官之所得，而为闲居仰给之资，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……”欧阳修痛切地批评道，如此下

去，“四海之广不能容滥官，天下物力不能给俸禄矣”。

包拯对于宋庠的弹劾，并非滥用言事之权。这一举动，对于北宋政治生态或者并无振衰起弊之功，然而，千载之下，仍然具有历史的启示性。